

2102

(14)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上)

8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第九輯

57.7.5/2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 九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慶市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重慶印制第一厂印刷

198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内 部 发 行

定价：0.74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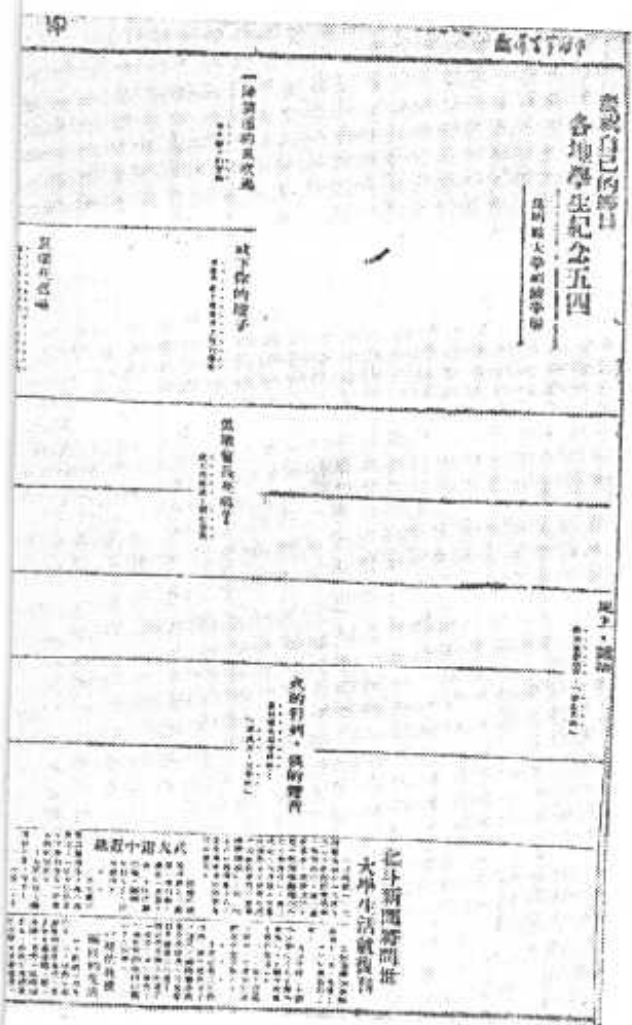
马寅初先生与重庆大学商学院全体师生举行话别会后合影（部分）。前排当中穿马褂者为马寅初先生。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

· 中共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供稿 ·



《中国学生导报》经常受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无理刁难，许多重要文稿被扣，无法刊出，只得“开天窗”。





征 发 (木刻卡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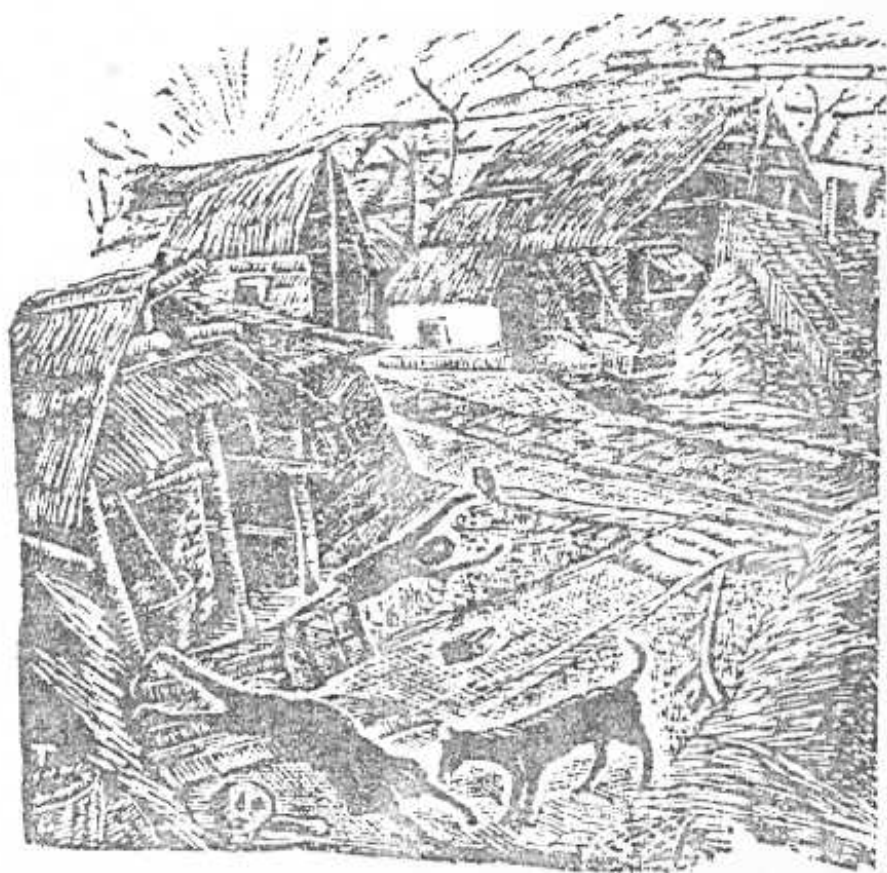
刘建庵作

(一九三八年)

四川的农村 (木刻)

鄧中铁作

(一九三七年)



目 录

八年烽火忆山城.....张友渔 (1)

抗战期中的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

及其演进.....谢立忠 (17)

育才学校的诞生和成长 ...原育才学校在渝部份师生 (28)

社会大学的艰苦历程 周西平 (45)

记《中国学生导报》 甘祠森 (60)

《中国学生导报》在战斗中

发展壮大 杜子才 戴文葆 李 湜 (66)

马寅初被捕始末.....赵国恩 (91)

郝桂林自杀经过.....雷启汉 (107)

陈独秀晚年生活.....张永通 刘传学 (116)

附：陈独秀抗日战争时期文章、讲演、书信编目

回忆中华剧艺社.....张逸生 金淑之 (126)

回忆怒吼剧社.....李智仁 张亚光 林嶽峰 梁少侯 (140)

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活动琐记 赵铭彝 (147)

第一届戏剧节纪实 黄中模 (153)

早期木刻运动在四川 鄧中钊 (161)

八年烽火忆山城

张友渔

一、初来重庆

我是一九三九年春到重庆的，来到重庆后，总理让我到国民党政府新设的“战地党政委员会”去任“设计委员”。做李济琛的统战工作，地址在两路口与曾家岩之间的巴县中学。

蒋介石设置这个机构，名义上是处理敌后国共两党关系，实际上是看到我党在敌后的发展，想设法削弱消灭我们的力量。这个战地党政委员会蒋介石自己兼主任委员，让李济琛当第一副主任，让总理当副主任，邵力子当秘书长。当时我们党中央已有决定，不参加国民党的政权机关，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反动政策负责。所以总理没接受这个职务，但为了做统战工作，争取李济琛反对国民党顽固派，便往里面派了些我们的党员，还有社会上的一些知名的左派人士。我就是这样进去的。

李济琛当时跟我们有联系，跟蒋介石有矛盾。蒋介石了解李与我们有联系而让李任第一副主任，企图利用他做我们的工作。我们对此自然也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我进去，主要就是做李济琛的工作，经常给他讲些问题，如国际国内形势等等。当时任“设计委员”的还有于炳然（党员）、梅龚彬（党员，而且为李济琛所信任）。秘书长邵力子是忠于蒋介石的，但他认为国共合作对蒋介石有利，所以我们也利用他的这一点，做工作。他比国民党那些死硬分子要好些，到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时，他还是过来了。蒋介石当时把他安排为战地党政委员会的秘书长，也想利用

他和我们的关系做我们的工作。

但我当时主要是做救国会的工作，在救国会中参加领导工作。救国会原领导成员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张申府、刘清扬等，加上我和王炳南，形成了领导核心。再加上钱俊瑞、于毅夫、曹孟君等，组成了十九人的领导机构。

救国会没有公开的机关，一般都在沈钧儒家（枣子岚垭“良庄”）开会。救国会和其他几个民主党派组成了民主政团同盟，还有无党派人士参加，在民主政团同盟中，左中右都有。

救国会在文化界是有力量和影响的，办有个“生活书店”，发行几个杂志，有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我每期写点文章，用过的名字有张友渔、章若椅、若愚、香汀、忧虞等。还写过一些小册子。我在《中苏文化》、《反侵略》、《反攻》等刊物上也写过文章。

我做救国会的工作，主要是搞民主运动、文化活动，针对民主宪政写了不少文章。另外，还写了些研究日本的文章，以适应抗战的需要。

这时还做了一件对民主运动有影响的事，即我和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钱俊瑞、韩幽桐共同写了《我们对于“五五宪草”的意见》一个小册子，由邹韬奋任主编，他们每人一篇，我多一点，写了二、三篇。就“五五宪草”每一章都提了批评意见；沈钧儒和邹韬奋去参加参政会时，还作为正式意见向大会提出。

我这个时期的工作，是在总理、董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总理、董老不在时，也由叶帅领导过。我当时是以左翼文化人的身份活动，不住在党的机关内，经常到曾家岩五十号去汇报请示。有时也去《新华日报》营业部向总理、董老请示汇报工作。总理、董老也常在那里约见一些人，那里人来人往买书的多，特务稍不注意，就上楼去了，比较方便。国民党所谓“还都南京”后，总理和董老去了南京。我留在重庆，参加四川省委后，就住

进了曾家岩五十号。

二、出 走 香 港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撕开它虚伪的面纱，对左派人士也不客气了。中央决定把左派人士疏散到香港去。党内派一些同志一道去做工作。香港的党的工作，当时属华南分局，中央派去做领导工作的是廖承志同志。我和夏衍、胡绳等同志在他领导下，做统战和文化工作，每个星期由廖主持开个碰头会，商量布置工作。我主要还是搞救国会工作，在香港成立了“救国会香港工作委员会”，邹韬奋是头头。从桂林去的杨东莼，因代表一个方面，是二把手。再就是范长江、我、韩幽桐、于毅夫，还有原在当地的金仲华。当时我们办了个《华商晚报》，由廖承志的一个表兄、银行家出面注册。范长江担任经理，胡仲持担任总编辑，廖沫沙是编辑主任，我是总主笔，负责审核社论。当时分工写社论的是：文艺部分由茅盾、夏衍写，民主运动邹韬奋写，国际问题乔冠华写，思想问题胡绳写，我负责写有关抗战和日本问题的社论，也写一些民主宪政方面的社论。

当时要去香港是极困难的，交通工具都掌握在国民党军统手里，我是利用战地党政委员会李济琛手下一个入买的公共汽车票，从重庆南岸上车经贵阳到桂林。这时，李济琛已调离战地党政委员会，在桂林担任蒋介石的桂林行营主任，我找到李济琛，让他帮我买去香港的飞机票。李让他的外甥、行营行政处长黎某给买的。黎某说：“张友渔不是共产党么？让他走好不好？”李济琛说：“让共产党走了，省得他在这里捣乱。还不好？”这是李济琛的秘书事后告诉我的。我在飞机上碰到邹韬奋，他也是李济琛给买的飞机票。我们走后第二天，蒋介石就给李打来了电报，“务劝邹回渝”。李济琛给蒋介石回电说，邹已经走了。如果晚一天走，邹韬奋就会被特务扣留。

我们在香港时，经常采取召集座谈会的形式，请文化界人士参加，讲讲国际国内形势。还办了几个刊物。一方面通过办刊物，维持一些左派文化人的生活，一方面做宣传。除金仲华等原办了《世界知识》外，邹韬奋、茅盾都办了刊物。张铁生（不是“四人帮”的走狗张铁生）还办了个《青年知识》。我常给这些刊物写点东西。胡绳协助邹韬奋办刊物，夏衍领导文艺界。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们就转入地下，在当时日美关系问题上，我们还犯过错误。

那时不是经常开座谈会吗？因为国民党老是宣传美国要打日本，我们反对蒋介石自己不积极抗战，老是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去打日本。我对日本有些研究，错误地认为日本是个资源缺乏的国家，棉花、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都离不开美国，它不敢碰美国，所以我们在座谈会上，常强调美国日本打不起来。后来总理来了电报说日美有打的可能，让我们做准备，我们才纠正了这个错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进攻香港的时候，我们仓促应付，布置不周，引起左派人士的不满，他们嘲笑我们对时局的分析估计错误，害死人！茅盾在《劫后拾遗》中说的“三个半国际问题专家”，“三个”是指金仲华、乔冠华、张铁生，“半”就是指的我（因为我认为我是日本问题专家，所以是“半个”国际问题专家），这种不满和嘲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当接受、反省。

转入地下后，我搬了两次家。第一次是因为日军从九龙开炮，把我住的房子打坏了，幸好没伤人，搬了。第二个住处，是一家商店的楼上。一天夜里，有几个武装伪军闯进来用刺刀抵住我的胸口，十分危险，韩幽桐还在被窝里，我问他们“干什么？”我是用日语讲的，他们一听，害怕了，大概是怕我和日本人有什么关系，慌慌张张地走了。事后，我又搬了，不能在那里住了。

地下党负责疏散工作的同志让我帮助他们找到邹韬奋、胡绳

等同志，把他们一批一批地撤离香港，然后，我和韩幽桐也离开香港。撤离香港的人，都已不能再走通常走的由轮渡到九龙；而是于夜间从僻静的地方，上地方党准备的小船，到有悬崖绝壁的地方，由上面的人用绳子把小船上的人一个个拽上去，然后到九龙地下党布置好的住处，化装成乡下人或商人，离开九龙。有的是走陆路，到宝安游击根据地，然后转内地，如邹韬奋、茅盾等；也有些人留在游击区。走水路的是由西贡上船，在沙鱼浦上岸；上岸后，经地下党安排住在田心村的一个海员家里。我和韩幽桐是走水路的，在海上，还遇到过土匪船，他们要抢劫，我们船上的游击队有武装，双方对峙了一会儿，土匪见到没有便宜好占，就撤了。从田心村走到叶挺同志的家乡茶园，碰上从陆路走来的茅盾和他的夫人，还有廖沫沙；廖沫沙负责照顾茅盾夫妇。同行的还有胡风夫妇，电影导演沙蒙、葛一虹、宋之的和他的爱人王萍等。在茶园住了一周左右，惠阳城日寇退了，我们由游击区交通员带着，一天走了一百来里，夜间到了惠阳。在途中，茅盾的夫人不慎落水，幸好水不深，没淹着，但已浑身水泥，搞得很狼狈。在惠阳住了一夜，县委通知我，廖承志同志已从惠阳去曲江（即韶关），要我到曲江去找他，并留下有联络地点。

从惠阳坐船到老隆，华南分局连贯同志在老隆旅馆接待，雇了几辆贩私盐的汽车，送我们去曲江。中途听说前边查私盐查得很紧，盐贩子不敢走了，又折回老隆，连贯已不在旅馆，找不到人了，搞到我们很着急。呆了一些时候，听说可以走了，汽车才又开出去。

到曲江后，找到了廖承志。他当时住在船上，乔冠华住在旅馆里，即廖承志留给我的联络点。我和韩幽桐通过乔冠华找到廖承志同志，他说南方局要我去桂林，负责接待从香港回来的左派文化人。在我到桂林前，南方局派一个秘密代表李亚群在桂林负责这件事。以左派文化人身份公开活动，协助李进行工作的是夏

衍。夏衍是和范长江、萨空了经澳门到桂林的，比我们走得早。后来南方局要夏衍回重庆，让我接替他的工作。从此，我在桂林呆了一年左右。

三、桂 林 滞 留

在桂林时，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接待和安排从香港回来的左派文化人。我接替了夏衍的工作，公开活动。同南方局派来的秘密代表李亚群联系。

我们安排的左派文化人，大部分都送往重庆。有一小部分，如邹韬奋、范长江去重庆有危险，国民党有加害于他们的可能，就送到新四军去了。邹韬奋从香港出来的时候，就留在广东，他的家属在桂林，组织上让我把他的家属送到广东，他们一起去新四军了。范长江同夏衍一起早来桂林，考虑到去重庆不安全，也难再起什么作用，也去了新四军。还有一些人，能留的就留在桂林。如狄超白、萨空了、司徒慧敏、廖沫沙等。后来形势紧张了，在我去重庆后，他们也陆续到了重庆。萨空了没有来得及走，被捕了。

当时，国民党在表面上也欢迎文化人返回重庆，他们派了个CC分子刘伯闵，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来桂林接待。他是主张拉拢左派文化人士的。当时去重庆的交通很困难，我们也就利用他们提供的经费和解决交通工具的方便。我们告诉左派文化人士，只要他们主动来联系，可以接受他们的接待。因为他们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不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这种灵活性，对于当时的斗争是必要的，有利的。

除接待和安排左派文化人这一工作外，我当时还做了几件事。

一是继续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李济琛保持联系，做广西派头头的工作。广西派头头是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跟他们

的关系很深，我就通过李济琰做他们的工作。抗战初期，我在徐州和李宗仁谈过话，但不象跟李济琰那么熟。我还通过李任仁和陈劭先做李、白的工作。李任仁是白崇禧的老师，教过白的书，白相信他。陈劭先在李宗仁处工作，是参议一类的人物，受到李的信任。我是通过陈此生认识这两个人的，陈此生当时是国民党左派人士。

再就是做文化界的工作。经常有个集会，谈谈形势，讨论一些问题。参加的有邵荃麟、狄超白、司徒慧敏、杜宣（即桂苍凌）等。茅盾、田汉夫妇，在去重庆前，也参加过。

在这个时期，我写了《日苏关系二十年》、《日本国力再估计》等小册子，通过“新知书店”，以“国光出版社”名义出版。到一九四三年春，第三次反共高潮即将到来之时，总理来信让我赶快回重庆。我把事情清理安排之后，经司徒慧敏找了一家私人运输公司的汽车，离开桂林。司徒慧敏的老婆在桂林开了个裁缝店，司徒与青红帮还有关系，所以能搞到车辆。

我在桂林，前后大约一年左右。

四、重返山城

回到重庆，到曾家岩五十号总理住处，一进门，看到总理，总理就很关心地批评到：“你怎么才回来，我们着急得很！”总理当时那样关心同志，又亲切又严肃地批评，我至今还深深铭刻在心。我向总理汇报工作，总理了解得很仔细，我一直汇报了二、三天，总理听得很耐心，在汇报中谈到对广西派的估计，当我谈到有的同志对广西派估计过高，有些右倾时，总理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

我回重庆后，公开职业是“生活书店”的总编辑，住在书店宿舍，仍以左派文化人和救国会成员的身分，做文化界统战工作，参加民主运动，在党内担任文委秘书长，做统战工作，文委归董

老负责的统战部领导。文委负责人是徐冰，夏衍、冯乃超、胡绳等都是文委成员。郭沫若等左派文化人和一些左派文化团体，都由文委联系和领导。

另外，我还参加《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工作。我分工写民主宪政和有关日本问题的社论，外交部分由章汉夫、乔冠华写，夏衍、胡绳、许涤新分别负责文艺、思想、经济部分。

这时期，我的主要工作仍是以救国会为中心的统战工作和民主宪政运动。这时期救国会在重庆的领导成员已经不多了。以沈钧儒、王炳南、张申府、刘清扬和我作为核心。因此，民主同盟中的右派就嚷叫“救国会完全是共产党的外围”，说：“沈钧儒是共产党员的老丈人（范长江的岳父），张友渔、王炳南是共产党，张申府、刘清扬过去是共产党，现在还听共产党的。”

当时重庆曾搞“宪政促进会”，包括各党各派人士。我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后来集为一册，叫《中国宪政论》。还有《法与宪法》，《民主与宪政》等小册子都是生活书店出版。还写过《东京统治者》，在读书生活社出版。在《中苏文化》、《民主周刊》上也写过一些有关民主宪政和日本问题的文章。

一九四三年后半年，形势更紧张了。总理离开重庆回延安，不幸摔伤右臂，去苏联治疗。重庆的工作便由董老负责。为了应变，缩小了机构。

一九四四年的一个晚上，我在家中，忽然董老派徐冰乘汽车来接我到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去。董老告诉我，曾出卖过华南分局领导同志张文彬、廖承志的叛徒郭谦，已从广东来到重庆。因郭谦在华南分局时曾到桂林找我联系过，这次来到重庆，要带人来认捕我。这是我们的同志从中统机关得到这个消息报告了董老，董老决定连夜把我接到办事处的。过了两天，果然有人到我家查户口，韩幽桐在家，据说就是郭谦带入去的。

后来，南方局改为重庆工作委员会，董老是书记，王若飞当

副书记，童小鹏任秘书长，张明（即刘少文）任组织部长，委员有潘梓年、熊瑾玎、徐冰、钱之光。我和章汉夫是候补委员。

这时成立了政策研究室，董老兼主任，张明和我是副主任，主要是我负责。帮助我搞编写报告等具体工作的是刘昂。除特殊情报电告中央外，一般情况报告，大约一周左右编送一次。

到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初，郭谦问题过去了。我又可以公开活动了。工委便趁特务年关休假的机会，派我做为党的秘密代表，去成都做刘文辉的工作。董老和王若飞同志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同以刘文辉为中心的四川地方势力密切联系，研究如何配合反对蒋介石不抗战搞内战，和保卫西南的问题。我是乘私人的长途汽车去的。汽车的主人同我们有关系，是由徐冰给我联系的。

五、成 都 八 月

在成都这一段，主要是做上层的统战工作。

同刘文辉联系的线索是很复杂的，有三条线：先是通过青年党中一个叫杨叔明的打通关系，此人与刘文辉是儿女亲家。后来是通过张志和，张是刘的老部下，在刘手下当过旅长师长，原是我们的党员，后失掉了关系，当时还没接上。最后是刘文辉自己指定的一个与我联系的代表叫邵石痴，与我经常联系。这个人表示进步，网罗进步文化人，包括我们的党员，如田一平、李相符等，组织过“唯民社”，办过进步刊物《大学月刊》等。主办的是进步文化人马哲民、沈志远等。

刘文辉跟蒋介石有矛盾，所以跟我们拉关系。他那里还有我们从延安派去的电台和机要人员王少春同志和他的爱人，王少春同志是台长。但刘文辉同时和青年党也有密切关系。

我当时找到刘文辉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西南自保”的问题。因为当时形势急剧发展，日本攻势很猛，蒋介石有放弃西

南甚至投降日本的可能。我跟他谈，如果蒋介石投降，要反对。如果蒋介石向西北撤，西南应当“自保”，坚持抗战。我们可以支援他。我每个星期都要见他几次，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方针政策。

工委同时还派华岗去云南做龙云的工作，当时刘文辉和龙云这两个人，反蒋介石都比较坚决。我除了做刘文辉的工作外，也做邓锡侯的工作，这人圆滑，人称“水晶猴子”。同时还做潘文华的工作，他手下有个师长彭光汉，田一平和彭很熟，彭出钱办了个《华西晚报》，田一平当社长，我们派黎澍去做总编辑。名义上是支持民盟的报纸，实际是我们的宣教工具。当时还有一个《华西日报》，我们通过主笔之一杨伯恺写文章发生一定影响，杨后来牺牲了。

同时，我还做民主党派的工作。张澜当时住在成都，四川实力派的许多人都是他的学生和部下，对他们有影响，我同他经常见面。我们的许多同志如田一平、李相符等，都加入了民盟。

再就是负责领导统战系统的党员。以他们为核心，开展统战工作。主要的有由杨伯恺、田一平、张志和组成的小组，我每周跟他们谈一次形势，布置工作。田是党员，杨和张政治上按党员看待，当时还没解决组织关系问题。还有个联系较多的、是负责成都统战工作的陈于彤。在我领导下还有个名医叫王文鼎，解放后任中医研究院秘书长。他因行医的关系和地方大军阀大官僚很熟，常同这些人在一起，边抽大烟边谈问题，了解不少情况，也做一些宣传工作。抽大烟是坏事，我到成都后，住在他家里，发现他的这个毛病后，曾批评了他。但他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解放后，他戒了烟。还有个叫袁庶华的同志，是经营贸易公司的，同工商界有联系，也在我领导下工作，我曾一度住在他家里。我在成都不能常住在一个地方，最初住在张志和开的茶叶店里，后来搬到姓周的开的商店里，再搬到王文鼎家，最后搬到袁家。